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杨琥
编

夏曾佑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杨琥
编

夏曾佑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夏曾佑卷/杨琥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458-1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夏曾佑 (1863~1924) -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2357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夏曾佑卷

杨琥 编

Xia Zengyou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35.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63 000

定 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理解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径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夏曾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他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活跃人物，其思想和主张对晚清思想、文学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曾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详后）。他所撰写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即《中国古代史》）一书，严复在当时即称之为“旷世之作”，此后曾经多次再版，对后世史家钱穆、顾颉刚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详后）。夏曾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史、文学史、报刊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生平简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夏鸾翔（1823—1864），字紫笙，是晚清著名数学家，对中西数学均有研究，著有《少广缙蚩》、《洞方术图解》等算学书，与李善兰、戴煦并称为杭州算学三大家。夏曾佑出身望族，但年幼失怙。少时聪敏好学，泛览群书，曾入杭州敷文书院、紫阳书院等处学习。又曾随伯父夏凤翔游历上海、广州等地，目睹了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1888 年（光绪十四年），夏曾佑参加戊子科浙江乡试，中式第二十八名。1890 年（光绪十六年）赴京参加会试，获会元，殿试二甲第八十七名，赐进士出身。次年游历广东、香港、武昌等地，并结识陈三立、杨锐和钟天纬。1892 年（光绪十八年）返京，授礼部主事。是年在京初识梁启超，后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交往频繁。甲午战争爆发后，于 1894 年（光绪二十年）底离京南下返杭州。不久，赴武昌，与

表兄汪康年、朋友叶翰一起在武昌两湖书院、自强书院任教职，期间结识黄遵宪、吴铁桥等维新人士。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夏曾佑再度入京，任职礼部，后至密云任教职。是年结识谭嗣同、严复。次年年初，夏氏至天津，在育才馆任教职，期间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国闻报》，并任主编。在其主持下，《国闻报》刊载严复译著，宣传西方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思想，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夏氏初为避祸南归，后又入京候选。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夏曾佑被选授为安徽祁门知县，冬赴安徽任职。三年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卸任，特旨以直隶州知州遇缺即补。卸任后，夏氏寓居上海，旋丁母忧，守制不仕。1903年至1905年居上海期间，夏氏任《中外日报》主笔，并致力于编撰《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夏氏随清政府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编撰《宪政初纲》，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呼吁清政府订立宪法，实行宪政。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夏氏再赴安庆，充安徽省提学使司学务公所图书课长，旋任安徽直隶州广德知州、泗州知州，后任学部二等谘议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1924年病逝于北京。

二、“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1924年4月，夏曾佑逝世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梁启超得到消息，心情沉痛地撰写了《亡友夏穗卿先生》，同时发表于在当时享有盛誉的《晨报副镌》和《东方杂志》。在这篇哀悼文中，梁启超说：

近十年来，社会上早忘却夏穗卿其人了。……但是，若读过十八九年前前的《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的人，当知其中有署名“别士”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很感觉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别士”是谁，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亡友夏穗卿先生》，《晨报副镌》1924年4月29日）

而在四年前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回顾、总结他青年时期的思想演变时，就曾指出：

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①

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夏曾佑，并非偶然。事实上，早在戊戌维新运动发生之前，夏氏即被他同时代的维新人士王修植、钟天纬、康有为等称赞为“梨洲嫡派”、“定盦化身”，是当世的黄宗羲与龚自珍。^② 宋恕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亦极力推崇夏曾佑：

穗公聪通，拔俗寻丈，定盦之后，几见斯人？^③

进入民国以后，蔡元培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以很多篇幅介绍夏曾佑的思想，并给予极高评价。^④ 钱玄同在为刘师培遗书撰写的序言中，列举了此前五十年“中国学术革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十二人，夏曾佑为其中之一。^⑤

众多学者、名家推崇夏曾佑，由此可见夏氏之思想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重要。在此，略举戊戌维新前后夏氏的“排荀”主张数端，以见其思想之特色。

近代中国的落后，西方列强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迫使中国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思想敏感的仁人志士寻求新的救亡之路，他们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以及先进制度的同时，不得不思考造成中国近代政治黑暗、思想闭塞和社会落后的原因。在这些仁人志士中，康有为无疑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于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提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祸首是西汉末的古文经学派的领袖刘歆。康有为的这一激烈观点，冲击了人们长期信奉的正统观念，引起了保守官僚及部分士大夫的反对。事实上，康有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② 宋恕：《致夏穗卿书》，胡珠生编：《宋恕集》，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③ 宋恕：《致姚颐仲书》，《宋恕集》，551页。

④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5卷，124～13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⑤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319～32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为的这一观点，在学术上非常武断，因此即使在维新派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针对康有为的观点，在南方很有影响的维新派学者宋恕就提出，“长夜神州之狱”应归于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颐（及程颢）。而夏曾佑则对康有为和宋恕的观点都不赞成。相反，夏氏提出，“长夜神州之狱，归重兰陵”^①，认为中国落后的祸首在于曾经做过楚国兰陵令的荀况，而并非刘歆或其他人。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夏曾佑在答宋恕函中，最早表达了这一见解。他说：“孔子之教”在流传中，“诸弟子有全闻者，有半闻者。全闻者知君主之后，即必有君民并主与民主，故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其不全闻者，不知后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恶而法后王”。“盖教门之宗子，所学者为帝王之学，而其他为辅也。而荀卿乃此中之一支。”夏氏认为，由于荀卿的弟子李斯相秦，“大行其学，焚坑之烈，绝灭正传，以吏为师，大传家法”。因此，叔孙通、董仲舒都是荀子之徒，西汉十四博士多半出于荀学。“盖中国之各教尽亡，惟存儒教，儒教之大宗亦亡，惟存谬种，已二千年于此矣。”无论是康有为提出的刘歆的经古文学，或是宋恕提出的北宋二程等的性理学说，“皆贼中之贼，非其渠魁”，而韩愈“不过晚近一辞章之徒”，“其已心亦不自以为一定，俳优而已”。在夏氏看来，导致中国“晦蒙否塞，长夜不暘，万事凌夷，遂有今日”的根本原因，在于“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所以，康、宋二人的见解，“譬犹加穿窬之盗以篡窃之名”，没有击中要害。^②

如果说这是夏氏在与友人私信中所展现的“思想火花”，那么，在1898年发表的《论近代政教之原》一文中，夏曾佑公开宣称：世人信仰和尊奉的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并非真正的孔子之道，而是经过后世帝王改造的为其统治服务的“秦人之教宗”。他指出：

惟我神（洲）〔州〕，建国最早，文、周、孔、孟之圣，《易象》、《春秋》之经，其法繁备，其道变化，率而循之，万世无弊可也，与埃及等邦之古教，一成而不变者不同也。然则何为而成此一成不变之俗哉？曰祸始于秦而已。今日之政法，秦人之政法，非先

① 宋恕：《致夏穗卿书》，《宋恕集》，526页。

② 以上引文均见夏曾佑《致宋恕书》。本文所引夏氏言论，均已收入本书，故只注篇名，其他出处从略。

王之政法也；今日之学术，秦人之学术，非先王之学术也；今日之教宗，秦人之教宗，非先王之教宗也。

秦人创业垂统几三千年，至今日而始觉其不可用，岂偶然哉？盖必有微言眇旨以运乎其间矣。……祖龙与韩非、李斯，相契若是之深也，是以秦人一代之政，即荀子一家之学，千条万派，蔽以一言，不过曰“法后王”与“性恶”而已。惟法后王，故首保君权。古之治天下也，以民为本位，故井田、学校、封建，均从宗法而积之；今之治天下也，以君为本位，故财赋、兵刑、建置，均从天子以推之。惟人之性恶，故猜防御下。古之人知天下之可为君子，故衣裳钟鼓之化，达乎上下；今之世料天下之必为小人，故凡食货、选举、职官一切诸政，非以求进化也，防流弊也；非以待驯良也，御盗贼也；非以礼士夫也，蓄奴隶也。（《论近代政教之原》）

尽管对于中国社会长期信奉的圣人——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夏氏尚不敢直接予以批判，但他通过考察中国古代政教的起源尤其是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的演变，揭示了世人所尊奉的圣人之道已被荀子、李斯、秦始皇所污染和败坏，而由秦始皇开创并为后世中国古代君王所继承的“阳儒阴法”的“政教”，是造成中国社会黑暗落后的主要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在当时乃石破天惊之语，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稍后，在《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一文中，夏曾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孔子之道在后世分为孟、荀二派，但孟学无传，荀学则大行其道：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称尧舜，荀子法后王；孟子论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礼》，此其大端矣。若其小节，更仆难终。孟子既没，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汉人因之，遂有今日。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则其学必为荀子之学无疑。故先秦两汉皆兰陵之学，而非孔子之宗子也。（《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夏曾佑批判荀子，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从荀子学说本身出发去理解荀子，而是从他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出发，即从反对既存“政教”的政治需要出发，借批判“荀学”而批判当时人们所崇奉和信

仰的“政教”。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变法，要求改革现存的旧“政教”，重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政教”。因此，他的结论是：

夫以秦法为因，而遇欧洲诸国重民权兴格致之缘，于是而成种亡教亡之果。昔人有言：圣人之道，与时消息，生今反古，灾及其身。事至今日，使其道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犹当斟酌损益，与时偕行，而况所守者，乃秦人之法哉！（《论近代政教之原》）

在前揭纪念夏氏文中，梁启超说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和夏曾佑、谭嗣同等共同发起“排荀运动”：“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亡友夏穗卿先生》）并说“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①。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近代，首倡“排荀”主张的学者正是夏曾佑。他不愧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

夏曾佑的“排荀”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正面的例子是谭嗣同。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②这些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而这一说法的来源无疑是夏曾佑。^③通过谭嗣同的文章，辛亥、五四一代的学子多受到夏、谭“排荀”主张的影响，如李大钊即在《民彝与政治》、《乡愿与大盗》等文中多次阐述了这一观点。反面的例子是章太炎，他在戊戌维新前后撰写了《尊荀》一文，并列于《诂书》的首篇，展开与“排荀”主张者的对话和辩难，显然，此乃夏曾佑主张引起的反弹。^④

三、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拓者

如果说夏曾佑关于荀学与秦政之关系的深刻见解，最初仅限于友朋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9页。

② 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3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③ 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收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④ 参阅朱维铮《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又拙作《戊戌时期章太炎尊荀思想及其中西学术渊源》，收入《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之间的通信传播，后来才逐渐扩大影响，那么，他所撰写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下文简称《中国古代史》）一书，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则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一书，原本为晚清的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原计划五册，完成三册）。该书撰写于1903年至1905年，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5年出版第二册，1906年出版第三册。在1906年以后的几年内，该书多次印行。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大学丛书”，将该书收入重版，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夏著也因而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教材，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再版发行。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又将《中国古代史》（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影印）列入第二编历史、地理类。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系列丛书中，将《中国古代史》选为第一种，与另外三十二种史学名著并列重新出版，并于2003年重印。2006年，团结出版社对原书配以插图，重新分卷，出版了插图本《中国古代史》（上下）。夏氏《中国古代史》在百余年间，从中学教科书，到大学用书，到史学名著，地位不断升格，反映了该书在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及持续影响。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学教科书，何以会产生如此持久的影响？该书究竟有何特色与贡献？编者以为，该书的特色在于：

（一）从当前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寻救亡图强、解决现实问题之法。

《中国古代史》开宗明义，申明其著述宗旨是：

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旨……（第一册《叙》）

这就是说，他撰写历史著作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讲述历史知识，而是为了探究历史演变之因果，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只有深入研究历史，才能更加看清当前社会积弊积弱的症结所在，找到解救的良法。而通过了解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又能使人们清醒地认识目前所处的环境

与时代，从而推知将来或发生更大的危机，或通过变革而获得新生。他举例说：

读我国六千年之国史，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如大《易》然。至完密之政治，如《周礼》然。至纯粹之伦理，如孔教然。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无有愧色。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哀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洎乎读近今之史，则五代之间，我之佣贩、皂隶，与沙陀、契丹，狂噬交拚，衣冠涂炭，文物扫地，种之不灭者几希。赵宋建国，稍稍称治，然元气摧伤，不可猝起，而医国者又非其人。自此以还，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此又令人怅然自失者矣。（第一篇第一章第五节《历史之益》）

然而，物极必反，历史的演变发展又是辩证的，中国社会的自身变化与西方冲击相遇，预示着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大变局，而未来亦将有新的命运、新的前途：“虽然，及观国朝二百余年，道光以前，政治、风俗虽仍宋明之旧，而学问则已离去宋明，而与汉唐相合；道光以后，与天下相见，数十年来，乃駸駸有战国之势。于是识者知其运之将转矣，又未始无无穷之望也。”他强调指出：

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第一篇第一章第五节《历史之益》）

这也正是夏氏著史之意。在第二册的开头又再次强调：“今中国之前途，其祸福正不可测。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而秦、汉两朝，尤为中国文化之标准。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读本期历史之要旨》）强烈的现实关怀，把总结历史与当时社会变革的紧迫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古代史》在当时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之重要原因。

（二）运用西方新知、新理来分析和解说中国古代历史，改造中国正史系统。

《中国古代史》是夏曾佑运用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的新眼光、